

新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与战略抉择

王红续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京 100091)

〔摘要〕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等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思想, 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对外交往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些价值原则引导着过去和现在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抉择, 并将继续成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决策指南。

〔关键词〕 新中国; 外交; 价值理念; 战略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6-0009-08

1949年以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 根据最高决策者对国情和国际环境的认知与判断, 中国外交的价值重心与战略谋划有所不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奠定了新中国外交价值理念基础, 以维护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与国家安全利益为重点, 制定了一系列外交战略与政策。邓小平依据新的时代主题, 把发展摆在了中心的位置, 在对国际形势与民族需求冷静分析的基础上, 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战略。国际冷战结束后,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全面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基本价值理念的同时, 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提出了和平发展新道路与“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 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外交工作,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切对外交往中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 从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到胡锦涛等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珍视和坚持这一根本外交原则。新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无不体现独立自主精神。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重视独立自主原则, 不仅是因为独立自主体现了民族国家所具有的主权观念和平等意识, 而且是由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不断丧失主权和领土, 沦为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 而为了重新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中国人民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牺牲了千百万人的宝贵生命, 百年的屈辱遭遇和艰辛经历, 使中华民族格外珍视这一价值原则。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毛泽东就制定了贯彻独立自主精神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外交战略方针。前者是为了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划清界线, 后者是为了彻底清除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各方面残余影响和势力。周恩来谈到这两个方针的意义时说, “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 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执行这两个方针的结果, 使新中国“在

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1](P.49,51)}

从1953年底到1955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确定并广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在这五项原则中得到了清晰和集中的反映，地位更加突出，含义更加明确。第一和第三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基本要求；第四项原则中的“平等”也是独立自主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述了体现独立自主价值观的这些原则，作了新的补充和发挥。周恩来在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时，把五项原则展开为七条，还做了精辟的说明，赢得了与会亚非国家的广泛赞同。

在实践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严格遵循独立自主原则来处理中外关系问题，既坚决反对大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领土主权的损害，也完全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利益。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们坚决抵制苏联损害中国主权的做法，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道作风，不惜与苏联分裂。在台湾问题上，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毛泽东曾经对外国来访者说，不要以为中国已经完全独立，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有很大的问题，台湾就还在美国和蒋介石的手里。

1954年12月11日，缅甸总理吴努请求中国共产党派观察团到缅甸研究当地的紧张局势。毛泽东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只能让中国驻缅大使和领事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和公开的文件进行研究。吴努说：你们是应我们的邀请而来的，不是违背我们的意志而来的，因此不是干涉内政。如果我们请求的话，你们甚至可以派军队来，也不是干涉内政。毛泽东回答说：“不能说凡是政府愿意的，就不是干涉内政。”^{[2](P.194-195)}最后，吴努放弃了他的建议。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开始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而在援助这些国家时完全尊重了它们的独立主权，并且正是为了帮助它们尽快地发展起来以更好地保证独立地位。为此目的，中

国政府制定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中国自己珍视独立自主，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尊重别国的独立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权益。这里体现的正是中国的传统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价值原则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或变通。比如，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香港和澳门问题实行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保持现状方针，虽屡受国内外的质疑和责难，但始终予以坚决贯彻。“一边倒”原则也受到了有些人的怀疑，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毛泽东则指出，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当然，他也承认，苏联对中国的独立自主还是造成了影响。比如，1949年10月南斯拉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迫于苏联的压力，毛泽东决定不同南建交。

实际上，毛泽东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制定外交战略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边倒”联苏抗美战略和后来的联美抗苏“一条线”战略，都没有体现彻底的独立自主原则。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为中国确定了彻底的独立自主外交立场，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为中国外交赢得了更大的空间，展开了全方位外交。

邓小平在阐述独立自主原则时说，它始终是我们的立足点。他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3](P.320)}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邓小平面对西方对华制裁的严峻形势，坚决维护中国的尊严，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使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坚定的独立意志和强大的国格力量。

在处理与外国政党之间关系上，邓小平倡导的这种外交理念也得到了体现。他反对以一国一党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别国和国际共运的是非，坚持各国党要根据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决定本国问题，强调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自对自己事情的

判断和选择的原则,主张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

二、和平为上

和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儒家、道家学说崇尚道德、仁义、无为而治,反对战争、侵略。即使是大军事家孙子也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和平价值取向始终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实践。中西方在外交理念及价值观上存在着重大区别。15世纪上半叶,郑和七下西洋,为的是怀柔四方,而不是像那个世纪末由西欧开始的“地理大发现”那样,到世界各地去掠夺财宝,征服弱小民族。中国自古爱好和平,笃信仁义。

近现代西方崇尚丛林法则,致使强权政治盛行,弱肉强食,战争频繁,直至引发两次造成极大灾难的世界大战。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经受了列强带来的长期屈辱与战争灾难,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更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倡导和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成为指导中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

在经历了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悲惨遭遇,并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后,中国极为珍视独立自主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所以,中国政府在追求和平理想时,必然要以维护本国的独立自主和安全为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三条,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规定了和平的前提。这三条原则成为从毛泽东、邓小平到现任中国领导人始终恪守的和平条件,他们确定和实施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是为了要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强权的极端不合理状况,坚决反对以强凌弱、侵犯别国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的强权政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为出发点与归宿,中国要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世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1954年曾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

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其次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印度、缅甸、印尼等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最后,还运用到处理与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总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全方位的普遍运用,在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生命力。

但是,作为理想的和平价值理念,却与不同时期的世界现实产生巨大的反差,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首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现实的东西方尖锐对峙格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其中主要是和平理想与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危险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毛泽东的“左”倾阶级斗争理论之间的矛盾。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与和平价值标尺相结合,把当时两极冷战世界格局看成是和平阵营与战争阵营之间的对立。当周边发生威胁本土安全的战争时,中国领导人就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予以军事援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属于帝国主义战争阵营,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则属于社会主义和平阵营。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组织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将战火引到鸭绿江边。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不仅对中国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而且是对东方和平阵营的极大威胁,所以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国也采取了类似姿态。

中国领导人为坚决反对战争势力,维护世界和平,把外交工作视同军事斗争,认为它只不过是“文打”而已。因此,中共中央从人民解放军抽调大批干部出任首批驻外大使、参赞等高级外交官。毛泽东还把过去在国内军事与政治斗争中成功运用的统一战线策略应用到外交斗争中。首

先,毛泽东没把西方阵营看成铁板一块,而是分成三派:美国这样的主战派,以英国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以及北欧等主和派。根据这种划分,他对西方阵营采取了孤立美国、争取英国等中间派、团结主和派的外交策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毛泽东开始把苏联视为与美国一样的战争贩子,采取了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他开始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缓和中美关系,集中防范苏联的战争威胁。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国内形成和强化的“左”倾理论与实践,加上毛泽东对时代问题和世界形势作出了不准确的判断,进一步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使之一度偏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左”倾外交战略开始形成之时,中央领导层中有些人曾提出过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战略设想。但这些合理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使中共中央失去了一次调整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的重要机会。此后,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和国内大规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外战略上的“左”倾错误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严重地偏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中国外交造成了极大被动。

从1969年开始,毛泽东在国内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却在外交领域进行了非意识形态化的重大调整。他改变了既反帝又反修的外交战略,抓住时机改善中美关系,实行“一条线”的联美抗苏新战略,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表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开始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三、和平发展

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冷静观察,对时代主题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据此坚定地

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为路径的国家发展战略,并适时调整了外交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外交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核心,更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中心,解决一切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维护世界和平,都要靠“发展”。这一核心外交理念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最大发展。

在国际形势方面,邓小平观察到世界和平和战争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转折后,就坚决地改变了毛泽东关于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战争问题的新判断,邓小平改变了以往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实行的“一条线”战略,转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改善了同美国、日本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这就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争取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邓小平不仅对战争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并由此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而且进一步对全球性战略问题或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概括。他指出,世界上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他还深刻地指出,在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之中,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发展当然需要和平的环境,但持久的和平则需要发展来保证。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快发展,发达国家则需要继续发展。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搞好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是解决内政外交、祖国统一等各种问题的最主要条件。邓小平确信,坚持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及由此调整的外交政策,中国就可以放胆地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和

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中国有用的东西,以加速中国的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争取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曾经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消除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思维的影响,摒弃“敌我”观念,树立国际是非观念,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对外开放理念和政策。他认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很难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科学技术和资源,很难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所以,他决定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市场,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还提出了外交要为中国建设和国际经济合作服务的指导思想,促使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配合国内各经济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加强了经济调研,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具有强大生命力。他还把和平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还大力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剧烈动荡。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著名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其中“有所作为”,是指中国在“不当头”和做好“自己的事”(即抓住时机,大力发展自己,尽快把中国经济搞上去)的前提下,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以上关于时代和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以及有关“发展是硬道理”、“对外开放”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外交价值理念,为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所继承,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充实和创新。

四、和谐世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就提出了鲜明的外交价值理念,坚决反对国际关系中盛行的损人利己、欺压弱国的强权政治,向往国家间和睦相处的新型关系。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尖锐地批判殖民主义,倡导新的“世界主义”外交理念。他说:“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4](P.72)}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诗中,形象地描绘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可见,在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毛泽东倡导利人又利己的价值取向。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国际和平和正义,同时又倡导国家之间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进行互利合作,以推动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平等互利原则,为促进国际经济文化合作、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中国一成立就已经确立了这条原则,并付诸实践,以建立和扩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毛泽东1954年10月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也谈到了互利合作问题。他指出:“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5](P.167)} 周恩来还把平等互利原则具体地表述为“互通有无”,作为新中国拓展对外贸易关系的指导方针。

“互利”原则，深刻体现了新中国处理对外经济文化关系时的价值观和利益观。这种利益观的核心，就是主张“双赢”，主张在“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大家都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前提下，开展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中国国情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国际形势的历史性转折，在国际政治方面主要表现为苏美两极冷战对抗格局彻底瓦解，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在世界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各国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核心，进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动乱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治局面更加稳定，经济发展保持持续高速，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忧虑，抱着冷战思维和偏见的人开始宣扬“中国威胁论”，以影响国际社会的视听。他们担心“中国崛起”会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和霸权国家造成“威胁”，会打破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和力量平衡，甚至会引发激烈的争霸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一方面以铁的事实来驳斥这种谬论，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提出新的理念，指导新世纪中国外交实践，加强国际舆论领域的攻势，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主张，特别是提出了“新安全观”。旧安全观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无法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江泽民倡导的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

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江泽民还对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深刻论述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强调要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主张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2003年开始，正式提出和宣传“和平发展道路”（或“和平崛起新道路”），向世界各国说明，中国坚决不走历史上一些国家崛起的战争道路，而要继续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其要旨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两者是统一的整体。“和平发展道路”是将内政与外交、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完全统一的中国大战略，其核心理念就是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内政方面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上顺理成章地延伸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这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创新意识和系统辩证思维。同时，“和谐世界”理念是对时代进步所带来机遇的把握以及对新世纪人类面临严峻挑战的回应，是对江泽民有关“新安全观”等重要外交思想的直接继承和拓展，也是中国内政与外交、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统一的必然产

物。

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首次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和谐世界”理念对毛泽东、周恩来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提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和江泽民关于“新安全观”等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做了继承和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它不仅主张各国之间要“和平共处”,而且强调各国之间要进一步实现“和谐共处”。也就是说,各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和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保障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权利;应该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解决争端和冲突,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并不采取“破旧立新”的激进革命态度,而是作为这一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要与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一道,从内部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运用对话协商的方式,逐步地改革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经济理念上,它在继承“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强调各国必须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和和谐发展。具体地说,各国应该重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贫困;应该积极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维护经济安全;还应该以相互开放取代彼此封闭,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

在文化理念上,强调各国必须致力于实现不

同文明和谐进步。也就是说,各国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坚持平等对话和交流,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应该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和谐世界”价值理念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把视角从人类社会本身延伸到“大地母亲”,增加了生态文明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和谐世界”理念适应了时代的新特点新潮流,并对时代难题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主流。决定国际利益和力量格局的大国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大国之间虽然存在矛盾和竞争,但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因而更加强调互相协调与合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国之间发生全面对抗的可能性比较小。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印经济的发展,印巴政治关系的缓和,非洲整体和平局面的出现,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为建立和谐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又处在转型时期,政治经济动荡和发展不平衡成为这个时期的明显特征,各种矛盾包括生态危机也在凸显,对人类形成严重挑战,需要寻求更具包容性的思路,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和谐世界”理念就是中国面对全球治理难题提出的一种良好思路。

在“和谐世界”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中国进一步优化外交战略布局,充分调动各种外交资源,发挥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各方面的积极性,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和谐外交”,通过双边、多边方式,同世界各国加强全面合作与对话,不断开拓新的外交空间,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人类共同繁荣,以实现建设和谐周边、和谐亚太、和谐大国关系、和谐中非关系等更加具体的外交目标,努力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总之,独立自主、和平为上、和平发展以及

和谐世界等理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基本价值体系,指导着过去和现在中国的对外

战略和政策的方向,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指南。

[参考文献]

- [1]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A].周恩来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2] 毛泽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A].毛泽东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3]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A].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 [5] 毛泽东.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必须是互利的[A].毛泽东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如月)

· 学术信息 ·

《恐怖主义·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出版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王伟光的《恐怖主义·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2011年7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之一,该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了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书中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恐怖主义现状与特征及其演变趋势、世界反恐实践与反恐模式、中国的反恐战略等进行了详细阐述与分析。书中既有对恐怖主义的定性和理论层次的分析,也有基于大量统计数据的定量化实证分析,在此严谨的方法论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反恐政策,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反恐战略方面的思路。该书所指的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免遭暴力的威胁,这种威胁既可能指对国家生存的损害,即一些学者所说的存在性威胁,也可能指暴力对国家的强制,即暴力的行为体试图运用暴力迫使国家改变行为或意图。

(卷平冈)